

明凤阳皇陵神道石刻研究*

刘毅(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教授)

凤阳皇陵是明太祖父母之墓,为明朝最早建成的一座帝王规格的陵墓。陵园坐南朝北,由土城、砖城和内皇城三重城垣构成。由于营造年代早、一代之制尚未确立,该陵保留了不少唐宋陵墓的特点。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1],进一步讨论凤阳皇陵石像生的来源与流变。

一 凤阳皇陵石像生形象及其来源分析

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明太祖命左丞相李善长恭诣父母墓前立碑,并荐上陵号曰“英陵”;同年五月朔日,“更英陵曰皇陵”^[2]。当时所立碑上有“积土厚封,势若冈阜,树以名木,列以石人石兽,以备山陵之制”等语^[3],可知其石像生初建不晚于洪武二年二月。凤阳皇陵石像生位于砖城北明楼到内皇城金门之间的神道两侧,自北而南依次为:麒麟2对、狮子8对、望柱2对、马及把马官2组、虎4对、羊4对、文官2对、武将2对、内侍2对,总计28对。和巩义宋陵相比,取消了象及驯象奴、瑞禽、角端、蕃部客使,新增加了麒麟、狮子、宦官。该陵石像生制度不尽同于唐宋,也有别于明孝陵及以后诸陵,兹分述如下。

1. 石兽

(1) 麒麟

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有“兽则麒麟角端”等语,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张揖曰:‘雄曰麒,雌曰麟。其状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麒似麟而无角’。《毛诗疏》云:‘麟黄色,角端有肉’。《京房传》云:‘有五采,腹下黄色也’^[4]。《宋书》描述麒麟特征:“麒麟者,仁兽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则至。麋身而牛尾,狼项而一角,黄色而马足”^[5]。唐人封演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6]。《三辅黄图》记载:青梧观中“有二梧桐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肋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7];这应该不是神道石刻。《南齐书》记载:宋文帝长宁陵之“麒麟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8]。据此可知,南朝帝陵前的石兽在当时名曰“麒麟”,这种石兽东汉已不鲜见,属于南朝者尚有不少遗存,基本造型为走狮状,背生两翼,形象生动,神采飘逸。朱偃先生调查发现,“六朝陵寝,皆前列二麒麟(左者往往双角,右者往往独角),肘鬃腾焰,腾骧欲飞”^[9]。现存南朝陵墓石刻,一般双角者在墓前左侧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一般项目《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学研究》(12BKG012)中期成果之一。

(墓向朝南为东侧、朝东是北侧),称曰“天禄”;单角者在右侧(墓向朝南为西侧、朝东是南侧),名曰“麒麟”。南朝麒麟是目前所见到保留于陵墓前的石麒麟中年代最早的,通常称为带翼神兽。

凤阳皇陵两对麒麟形象基本一致,但前(北)面一对作行走状,后(南)面一对作伫足站立状(图一);与南朝麒麟相差很大,从面貌来看应该是来自不同的母题。但从其狮子形本体、独角等特征以及前对行走姿势中,可以看出源自南朝翼兽—北宋角端的承袭脉络。和凤阳皇陵麒麟最接近的石像生瑞兽形象是宋陵角端(图二),但两者差异也很明显。凤阳皇陵麒麟最突出的装饰特征是周身鳞纹,明以前帝陵石像生饰周身鳞纹者目前所知有陕西三原唐高祖献陵的石犀,但其鳞纹细碎,凤阳皇陵麒麟则为龙鳞。元代瓷器、织绣、石刻中有一些通常称为“瑞兽”的鹿形动物有此种装饰,它们也许是凤阳皇陵麒麟的来源之一。

(2) 狮子

狮子在唐宋皇陵中以守门者的形象出现,除偃师唐恭陵外不见于石像生队列中。唐陵门狮一般为蹲姿,张口、闭口并出。北宋诸陵石狮制度比较统一,自太祖永昌陵开始,南神门外的一对狮子皆为行走姿势,东张口,西闭口露齿。其余三门外门狮皆为蹲姿,通常也是一张口、一闭口。凤阳皇陵八对石狮的造型基本一致,皆为蹲姿,昂首,闭口而露齿。其形象来源应该是宋陵神城的守门狮。

(3) 马与把马官

唐宋皇陵石像生马的旁边皆有把马官^[10],唐为一入立于马前,宋为二人夹马而立,其服饰所表现的身份都是仆役或者宦官。凤阳皇陵为二人夹一马而立,其基本造型源自巩义宋陵,但是把马官中却有文官形象,可能是因为唐宋陵的把马官头部有所缺失,明初缺少参照或不明就里而臆想出来的。

凤阳皇陵两对马与把马官的基本造型明显有别:北面即紧挨望柱的一对,为1组2件

式,马北侧石人握鞭拱立,南侧石人与马合为一体,手牵马缰,马头略偏被勒而止步;其中西面一组石人梁冠交领袍,无须,为年轻官员或宦官形象(图三);东面一组梁冠交领袍,长须,为文官形象。南面一对为1组3件式,人马各自独立,马北侧石人梁冠交领袍,长须,双手握鞭而立,南侧石人梁冠交领袍,无须,叉手而立;仗马四足伫立,四腿之间未凿空,雕饰云



图一 凤阳皇陵麒麟(西列)



图二 宋太宗永熙陵角端(东列)

纹,所表现的应该是腾云的“天马”(图四)。马腹以下不凿空而浮雕云纹,这种形式不见于巩义宋陵,其形象来源是中唐以后皇陵主神道前端的“翼马”或“麒麟”(图五),说明凤阳皇陵石像生的设计不仅参照巩义宋陵,可能还曾经兼采唐制。

(4)虎

4对,皆为蹲姿、昂首闭口露两齿,身有斑纹,造型和装饰的基本元素脱胎自北宋皇陵,巩义八陵中仅宣祖安陵、太祖永昌陵、英宗永厚陵各有一只张口虎,其余皆为闭口式。

(5)羊

4对,皆跪卧姿,造型和装饰源自北宋诸陵,具体形象也相差不多。

2. 望柱

2对,柱身皆为八棱状,但高矮和柱头装饰不同(图六)。按柱头形式分为2式,在巩义宋陵中都能找到祖本。式柱头火焰宝珠式,顶尖如塔刹,宝珠下有束腰座,刻仰覆莲花纹,宋陵中最早见于太祖永昌陵等^[11]。式柱头为八棱状宝瓶式,三层顶尖,最早见于祔葬永昭陵的慈圣光献曹皇后陵^[12]。仁宗曹皇后卒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冬,此后神宗(卒于元丰八年,1085年)永裕陵、哲宗(卒于元符三年,1100年)永泰陵等帝后陵的望柱头与之相同(图七)。火焰宝珠式望柱头的出现年代较早,可以在唐高宗乾陵及以后诸唐陵中找到实例。北宋帝后陵望柱头的形式的变化完成于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4年)。晚于这个年代而望柱头较式略有不同者,只有祔于永厚陵的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陵,但大体上仍是宝瓶形。

凤阳皇陵为什么使用两对望柱,两种不同形式的望柱头何以并存,并且望柱夹于石兽中间,目前尚不得其解。

3. 石人

根据已知考古资料,石像生石人最早见于北朝。河南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宣武帝景陵和孝庄帝静陵前都有石人遗存或其残迹发现^[13],推测为北齐文宣帝武宁陵的河北磁县湾



图三 凤阳皇陵马与把马官(西之北)



图四 凤阳皇陵马与把马官(东之南)



图五 唐敬宗庄陵翼马



图六 凤阳皇陵望柱(自北向南)



图七 宋哲宗永泰陵望柱(西列)

漳大墓封土前也有石人遗存^[14],都是袍服拄剑式。唐高宗乾陵神道有石人11对,其形象和北朝一样。唐玄宗泰陵石人仍着袍服,但开始以手执物区分出文武官员的不同形象并分列于神道东西两侧:文官在东侧,秉笏;武官在西侧,拄剑^[15],此后诸唐陵因之。巩义宋陵石人继承了以不同装饰元素区分文武的传统,文官秉笏、武官拄剑,皆为梁冠袍服。和唐代不同的是,从永昌陵开始,改为文武官东西并列,而以文官置于武官上首(更靠近南神门)。这一变化和宋朝的尚文抑武的政策一致。

凤阳皇陵文官为梁冠交领袍服,双手秉笏(图八),其基本装饰元素与巩义宋陵完全一致,承继关系明确无疑。但武官的形象变化较大,为兜鍪铠甲装束,双手拄剑于前(图九),而不再是梁冠袍服。从服饰这个最直观的特征来看,它们的直接来源显然不是唐宋石像生中的武官;而且以武将跻身于文官之上(更靠近陵园核心内皇城),也与北宋之制迥异,与传统观念相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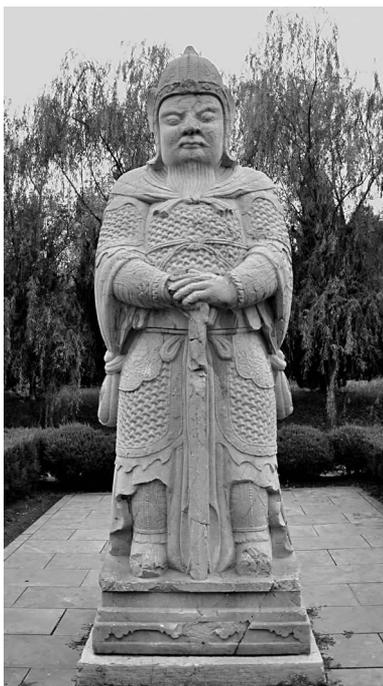
如果以冠服及相应的装饰变化作为考察重点,与明皇陵武官形象最接近的是北宋皇陵南神门外的铠甲将军。北宋自永昌陵开始南神门外皆有一对有盔甲武士形象的石人,立于门狮以北,不在石像生队列之中,一般称为“镇陵将军”,象征性守卫陵宫门。宋镇陵将军的具体

造型和装饰,特别是所执兵器不尽相同,太祖永昌陵为东侧双手执长柄斧于胸前、西侧双手按钺;太宗永熙陵为东侧双手按钺、西侧双手执钺于胸前;真宗永定陵东西两侧皆为双手执钺于胸前;仁宗永昭陵和英宗永厚陵东西两侧皆为双手按钺;神宗永裕陵和哲宗永泰陵皆为东侧者双手按钺、西侧者右手按钺左手握柄(图一〇)。全身盔甲、手执兵器是宋陵守门武士石像的共同特征,凤阳皇陵石武将的装饰要素与之相同。

凤阳皇陵石像生的最上首(靠近内皇城处)为宦官(图一一)。以宦官跻身于文武官员之上,不仅在唐宋皇陵石像生中找不到对应的源头,而且也匪夷所思。北宋各陵的南神门内和封土前各有石宫人一对(图一二),推其本意是侍奉墓主,和神城外的石像生无关,从装饰元素分析,凤阳皇陵宦官的形象应该是来源于此。明皇陵营造虽然以北宋陵为模本,但彼时巩义各陵早成丘墟,当时的考察人员可能并没有分辨清楚遗迹的不同内涵,把不同石人的形象直接用到皇陵,因而才有此不伦之例。这种模仿是原封不动的,连同先后顺序也照搬过来,所以才出现了文官、盔甲将军、宦官这种排列次序。和以官员为马夫一样,这也是明初礼制未定时的一个失误。明太祖孝陵石像生武将依然是甲冑装束,但将武将改置于文官下首,



图八 凤阳皇陵文官(东列)



图九 凤阳皇陵武将(西列)



图一〇 宋神宗永裕陵镇陵将军(西列)

并且取消了宦官；这种补救措施为以后明长陵、清孝陵等所沿袭。

二 凤阳皇陵石像生制度的影响和变异

作为明朝第一陵，凤阳皇陵的石像生之制不同程度地直接影响了盱眙祖陵和南京孝陵，间接影响了北京长陵及其以后的明清诸陵，在不断的继承和修正中完善了明清皇陵的石像生制度。

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太祖“命皇太子往泗州修缮祖陵，葬三祖帝后冠服”^[16]。泗州祖陵仿凤阳皇陵规制，是明太祖高、曾、祖三代合葬的招魂衣冠冢，位于今盱眙县管镇乡明陵村。祖陵陵园坐北朝南，由外罗城、砖城和皇城三重城垣构成；石像生位于皇城金门外（南侧），曾经淹没于湖水。这段神道所在为自然隆起的高岗，“石像生复原扶正的位置大体是正确的”^[17]。神道石刻自南而北依次为麒麟2对、狮子6对、望柱2对、马及把马官2对，过小沟一道，复有文官2对、武将2对、宦官2对，总计18对。

泗州祖陵规模和营造规制等都比凤阳皇陵略低，工程持续的时间也相对较长。永乐元年(1403年)，“工部以泗州祖陵黑瓦为言，帝命易以黄，如皇陵制”^[18]；十一年(1413年)，建成神库、神厨、棂星门等。嘉靖十二年(1533年)，祖陵奉祀朱光道奏请改易黄瓦、增设石像生。祖陵现存石刻的工艺风格并不完全一致，也许是洪武(或永乐)和嘉靖两个时代的作品。

和凤阳皇陵相比，泗州祖陵石像生裁减狮子2对、虎4对、羊4对，其中狮子保留了6对，而虎、羊则完全取消，这两种石兽自此不再用于皇陵。除第二组石马及把马官与文官之间隔有小沟一道(钻探确定为金水河)以外，石像生的排列次序和凤阳皇陵完全一致。在祖陵石像生造型和装饰等基本元素中，可以明显看出凤阳皇陵的直接影响。

麒麟2对，均为狮子形，独角、周身鳞甲等特征同凤阳皇陵，但全部为伫立状，头部变化较大，接近孝陵以后的形象，都为闭口式，嘴角露两齿。

狮子6对，全部为蹲姿，闭口露齿，基本造



图一 一 凤阳皇陵宦官(西列)



图一 二 宋真宗永定陵官人(西列)



图一 三 明长陵勋官(西列)

型和装饰与皇陵相同,但刀法细腻,并且各自的细部装饰风格不尽相同,应该是来自不同的设计粉本。

望柱2对,柱头也分为宝珠式与宝瓶式,基本造型和前后排列顺序与凤阳皇陵一致。

马及把马官2对,基本仿自凤阳皇陵。南面即紧挨望柱的一对,为1组2件式;其中马南侧石人握鞭拱手独立,北侧石人与马合为一体、手牵马缰,马头微偏,作勒缰止行状。北面一对为1组3件式,人马各自独立,马南侧石人双手握鞭,北侧石人叉手而立;仗马四足伫立,腹下原石雕饰云纹。

祖陵6对石人的基本造型和装饰特征与凤阳皇陵一致,总体上保留了皇陵的风格。文官2对,梁冠,长须,交领袍服,双手秉笏于胸前;武将2对,兜鍪,长须,全身铠甲,双手拄剑;宦官2对,翼善冠(乌纱帽),无须,圆领袍服(常

服),叉手于胸前。

南京紫金山明太祖孝陵神道石刻包括兽6种12对、望柱1对、人2种4对。石兽自前而后依次为蹲坐狮、立狮、蹲坐獬豸、立獬豸、卧骆驼、立骆驼、卧象、立象、蹲坐麒麟、立麒麟、卧马、立马各1对。神道转折处为望柱1对,其后为武将2对、文官2对。

明孝陵石像生制度与凤阳皇陵有了明显的不同,其继承和变异主要表现如下。

1. 石兽方面,孝陵神道恢复了宋陵中的象,保留了马,但取消了驯象奴和把马官;新增加了骆驼和獬豸;确立了石兽每种两对,前面一对蹲坐或跪卧而后一对伫立的形式。在6种石兽中,狮子位于队列之首,麒麟则位列第五,紧接在狮子之后的是獬豸。《宋书》记载:“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19],传说其独角可除奸恶。孝陵的麒麟和獬豸更多地保留了狮子的特征,

与皇陵、祖陵相比,麒麟仍是独角,但身长有所缩短。獬豸的形貌与麒麟几乎完全相同,所异唯身无鳞纹。二者均无双翼,仅在两腿等处饰以火焰。

2. 孝陵延续了望柱夹列于神道石刻之间的排列方式,但不是在狮、马之间,而是用以界分石人兽,并且减为1对。和凤阳皇陵以及唐宋诸陵相比,孝陵望柱柱身比例加粗,六边形向上略有收分,浅浮雕云纹;柱头硕大,为截尖圆锥状,雕饰龙纹。

3. 孝陵石人以服饰分为文武两种。文官梁冠,无须,圆领袍服,方心曲领,秉笏于胸前;武将甲冑,有须,左佩剑,双手执金瓜于胸前。和凤阳皇陵最大的不同在于,孝陵取消了宦官,并且和巩义宋陵一样,将文官置于更靠近陵宫的武官上首。武将沿袭了皇陵式甲冑装束,但改为佩剑执金瓜,表现朝会中的鹵簿仪仗,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皇陵的失误。

明孝陵神道石刻的内容和装饰形式,形成了一个基本固定的范式,为此后诸皇陵所继承。

北京昌平明成祖长陵神道(十三陵主神道)石刻有望柱1对和兽12对、人6对,“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石兽二十四,四马、四麒麟、四象、四橐驼、四獬豸、四狮子;各二立二蹲,(距陵宫)近者立,远者蹲”^[20]。长陵石像生制度直接继承自孝陵,但有几点变化。

1. 望柱1对,造型和装饰都与孝陵相同,但恢复唐宋之制,将其置于神道前端、石兽之前,成为石像生队列的导引。

2. 石兽6种,自南而北依次为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基本造型和装饰元素、排列次序等都与孝陵相同,只是刀法更加细腻。最突出的变化是麒麟和獬豸的区别更加明显,獬豸保留了狮身独角的形象,在《大明会典》中名为“兽”^[21];麒麟则再变为双角,顶上发毛向后上飘起,犹如从天而降,动感十足。

3. 石人6对3种,通常称为武臣、文臣、勋臣,在《大明会典》中依次称为“带刀执瓜盔甲

将军”、“朝衣冠文像”、“朝衣冠武像”^[22]。盔甲将军和文官沿袭了孝陵石人的基本装饰元素,所不同处在于文官皆为梁冠,有须,交领袍服带方心曲领;而将军则全身甲冑,南面一对左手抚佩剑,右手执金瓜,北面一对叉手于胸前,衣袖等处不再有皇陵、孝陵所见的膊甲中露出宽袖袍服的形式,进一步凸显其所象征的不再是朝会中的武官形象。勋臣即“朝衣冠武像”是长陵新增加的内容,其基本造型和装饰元素同文官,但在七梁冠上另有加笏巾(图一三),象征朝会中的武官(包括有公、侯等世袭爵职的武官),从而彻底纠正了凤阳皇陵对于石像生武官服饰装束的错误理解和表现。

凤阳皇陵石像生制度在宋明之间的过渡意义十分重要,不厘清凤阳皇陵石像生所自来,就很难理解明清皇陵石像生形象的准确涵义。凤阳皇陵石像生对于明清帝王陵石像生制度有很大影响,石人尤为突出。由误学导致了甲冑武将形象的出现,经孝陵、长陵不断修正变化,最终成为帝陵石像生的常见之制。

- [1] 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58~65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 [2]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二月乙亥、丁丑”;卷四二“洪武二年五月甲午”,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缩微卷校印《明实录》,第788、82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62年。
- [3] (明)危素《大明皇陵之碑》,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国事类·皇陵碑》,第115~116页,中华书局排印本,1959年。洪武二年所立《大明皇陵之碑》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改建皇陵,明太祖废弃原碑,御制新碑文竖石于陵前。
- [4]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25、3026页,中华书局,1973年。
- [5] 《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第791页,中华书局,1974年。
- [6]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四库全书》第862册,第44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5年。
- [7] (汉)佚名《三辅黄图》卷五《观》,第316页,三秦

- 出版社,1995年。
- [8] 《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疑传》,第414页,中华书局,1972年。
- [9] 朱僂《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第8页“六朝陵墓之特点”,中华书局,2006年。
- [10] 唐宋时期牵马者在当时人笔下多称为“控马”或“控马卒”;《宋会要辑稿》第二十九册《礼三三》之“钦圣宪肃皇后”条下称为“把马官”。
-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第3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 [12] 同[11],第160、166页。
- [13] 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孝文帝陵墓的调查和钻探》,《文物》2005年第7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文物》2007年第10期。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邳城考古队等《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第11~14页,彩版1~2,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5] 马文良《唐玄宗泰陵的石雕》,《文博》1991年第4期。
- [16] 《明史》卷五八《礼志十二·山陵》,第1446页,中华书局,1974年。
- [17]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明祖陵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00年第4期。
- [18]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一七《礼·山陵》,第270页,中华书局,1956年。
- [19] 同[5],第807页。
- [20] (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第5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又,清初梁份《帝陵图说》卷二、清末《光绪昌平州志》卷一〇中相关文字记载略同。今人关于明长陵石像生之名多从此说,明孝陵各件石刻亦对应长陵而定名。长陵石人兽在明朝所修《大明会典》中有不同名称,详后文。
- [21] (明)李东阳等奉敕修、申时行等奉敕重修《大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山陵》,第2729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89年。
- [22] 同[21]。

(责任编辑:杨冠华)